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20年4月20日 (第212期)

内部交流 仅供参考 请勿引用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新冠危机凸显中美合作的必要性

COVID-19并未改变美中战略关系的基本面——地缘政治、互不信任和系统性竞争一直在推动两国走向对抗和相互指责。然而，这种趋势并非不可改变。

中美关系

荣鼎集团分析新冠疫情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

荣鼎咨询集团网站 3 月 30 日载文称，自 2016 年以来，中国对外投资额一直在下滑，而新冠病毒令中国对外投资在 2020 年初陷入停顿。文章摘要如下：

中国宏观政策与国内政策所面临的阻碍比人们感知到的要大，中国对外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国内宏观经济面临“逆风”以及资本管制。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了这些问题，中国金融稳定现在正面临更大的风险。

全球市场波动可能会创造买入机会，一些中国公司已准备好利用全球公司估值大幅下降的机会。然而，中国投资者在海外面临着更严格的审查与监管。过去 10 年，许多联合国经合组织成员国对本国的投资审查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一些国家政府正在考虑制定特别规定，以保护企业不受外国买家影响。

面对持续的国内政策限制、宏观环境变化以及国外审查，中国不太可能重现 2015 至 2016 年的对外投资热潮。不过，部分中国投资者将在未来几个月加大投资力度，尤其是收入流相对稳定、能够获得离岸资本的大型民营企业，以及中国国有企业。

在如今充满失信与错位的大环境下，中国投资将给外国政策制定者带来特别的挑战，他们需要谨慎地辨别这究竟是商业行为还是可能在后疫情时代足以改变地缘政治平衡的战略策略。

美专家：美对华战略不会因为新冠疫情而大幅转变

《国家利益》杂志网站 4 月 3 日登载特朗普过渡团队成员、

传统基金会外交政策专家詹姆斯·杰伊·卡拉法诺 (James Jay Carafano) 的文章称，美国对华战略并不会因新冠疫情而发生大幅改变。文章摘要如下：

特朗普政府很可能延续原有政策，在中国对美国利益造成侵犯的领域进行反击，例如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领域，直到中国停止破坏行为并尊重美国及其盟友的权益。预计美国将在以下四大竞争领域增加投入：

西欧方面，美国或加倍努力巩固大西洋两岸的关系，以应对中国对西欧国家的拉拢；亚洲方面，美国必须确保在印太地区的关键伙伴关系，“四方安全对话”框架是将合作推上一个台阶的完美工具；非洲方面，大中东地区与欧洲对美国而言是关键战略地区，而它们的稳定部分取决于南面的非洲大陆，加之中国在非洲具有广泛的破坏性影响力，预计美国将在该地区加倍投入，且进一步与欧洲盟友以及欧盟合作；国际组织方面，中国试图使这些国际机构为中国的利益服务，美国将在未来几年采取行动限制这类渗透手段。

如果 11 月特朗普未能成功连任，美国对华政策的轨迹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还不得而知。但 2021 年无论谁入主白宫，许多人都会惊讶地发现，未来对华政策的连续性将大于变化。

新冠疫情为缓和中美紧张关系提供机遇

《外交事务》期刊网站 4 月 6 日登载美国前副贸易代表、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主席温迪·卡特勒 (Wendy Cutler) 和美国务院前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主席丹尼尔·拉塞尔 (Daniel Russel) 的文章称，新冠病毒的暴发给中美合作、建立互信提供了机遇。文章摘要如下：

早在疫情暴发前，中美关系就已急剧下滑，因此疫情暴发后两国利用疫情大打政治牌也不足为奇，但宣传战和相互指责并不能战胜病毒，也不能阻止即将到来的全球经济衰退。中美两国有大量资本和人力资源，为避免全球经济崩溃，促进挽救生命的医学研究，两国必须开展双边合作，共同引领更有效的全球响应。

医疗合作是当前第一要务，两国应立即合作开发疫苗，开展临床试验。双方必须将已批准的关税减免措施永久化，同时取消疫情相关医疗资源和人道主义资源的剩余关税。两国还应该引导二十国集团成员国承诺保持供应链开放运转，不对必要的医疗设备与医疗资源实施进出口限制。作为今年七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美国应邀请中国参加会议，共同协调战略，以降低疫情造成的损害，并为经济迅速复苏做准备。

此外，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对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债务陷阱外交”发出警告。如今，随着医疗危机迫在眉睫，世界经济摇摇欲坠，美国应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以及日本合作，帮助中国制定措施，减轻或免除其在最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所持有的巨额债务。

联合行动将使两国在目前这一关键时刻发挥领导作用，上述措施可以在中美之间建立必要的信任，并为在其他问题上取得进展奠定基础。中美两国不需要成为最好的朋友，但双方可以用行动表明，危机也可以让两国展现出积极的一面。

美专家：美国该如何在巴基斯坦应对中国？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网站4月8日登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丹尼尔·马基（Daniel Markey）的文章称，特朗普政府对“中巴经济走廊”的绝对批评，体现了美国对中巴

商业和经济关系的过度关注，或导致美国忽略更深层次的问题。

文章称，美国应考虑两个基本事实。其一，与亚洲许多国家一样，巴基斯坦不想在美中之间选边站。其二，“中巴经济走廊”只是中巴关系的一部分。美国应关注中巴关系三个更广泛的方面：首先是中国对地区稳定尤其是印巴关系稳定的影响；华盛顿应以更有效的方式与北京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力展开竞争；从长远看，美国希望权衡中巴防务伙伴关系的地缘政治影响，包括中国在巴基斯坦的存在如何有助于其向南亚和中东投射军力。

比起效仿中国的基建投资，美国应让自己变得更有吸引力。美式教育、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也许是首选，美巴贸易也能为后者带来利益。美国应帮助更多巴基斯坦人从外部投资中获益，并鼓励巴政府实施市场开放改革，尽可能为其提供技术援助，为各种重要议题分享专业技术。美国应选择更细的方式，解决数百万巴基斯坦人面临的日常问题，公布空气污染数据就是一则成功的例子。美国应考虑是否有其他类似政策，充分利用并突显美国的技术、数据和自由获取可靠信息的能力。

美国还应考虑，从长远来看中国在巴的哪些政策对美国最不利。比如，中国架设的光纤线路“控制”了巴数据，侵蚀他们的自由。美国应开发和传播科技工具，帮助巴基斯坦人获取可靠的信息和数据，并与其他国家分享他们的想法。此外，美国应保护在巴人权和自由价值观捍卫者。

在军事方面，美国需密切关注中巴防务合作的演变，尤其是核领域。未来中国对巴援助可能会打破印巴军事力量的平衡，而中国在巴开设的军事基地也为中国提供了战略利益。

更多巴基斯坦人开始发现中巴关系的局限性，美国政府应停止过度抨击，开始着重体现自己的举措，并关注中国在巴实施的具有长期意义的战略和政治发展。

新冠危机凸显中美合作的必要性

COVID-19 并未改变美中战略关系的基本面——地缘政治、互不信任和系统性竞争一直在推动两国走向对抗和相互指责。然而，这种趋势并非不可改变。

《国家利益》杂志网站近期登载美国前国家情报官员、美国国家利益中心杰出研究员保罗·希尔（Paul Heer）的文章称，新冠危机凸显了中美联手对抗病毒、加强双边合作和建立互信的机遇和必要。文章摘要如下：

不妨回顾一下 2020 年初的中美关系。两国关系在几个地缘政治趋势的作用下螺旋下降：第一，“中国崛起”和美国相对衰落导致双方分歧越来越大；第二，许多仍有冷战思维的人假定这种分歧反映并加强了双方关乎生存的意识形态竞争；第三，过去三年，双边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原因包括贸易战，以及美国加大对中国经济外交、军事部署和影响力行动的关注。三个因素衍生出第四个因素，双方都有恣意曲解和歪曲对方战略意图的倾向。

然后 COVID-19 暴发了。不出所料，北京和华盛顿的早期反应反映了已有的战略不信任、误解和竞争。这一点在两个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关于病毒起源的说法，以及关于哪国正在更有效地抗击病毒。

的确，北京显然正利用这场危机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得分，推进“全球治理改革”和一个更加关注和代表中国利益的国际“利益共同体”。但与疫情暴发前一样，在经历 COVID-19 之后，美国不应夸大或歪曲北京的战略野心。尽管中国正在寻求扩大其相对于美国的国际影响力，且不惜损害美国利益，但其并不想消灭美国或取代之成为全球霸主。

中国的目标更加有限和务实，因为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即使全球霸权能够实现（他们对此表示怀疑），也将是不可持续的，而且更像一种负担而非恩惠。北京寻求的是在国际上使其治理和发展模式合法化，以便与其他模式和平共处，增加中国在制定全球治理规则方面的影响力。北京希望巩固中共在国内的统治，确保外部环境和平，让北京能直面无数艰巨的国内要务。COVID-19为北京提供了一个推进这些目标的机会，因为它可以声称其体系在国内有效控制了病毒，并在国外提供了援助和建议。

这足以对美国构成前所未有的战略挑战。即使人们不相信中国正试图削弱美国、统治世界，这种挑战也是存在的。这种挑战反映了美中两国体制之间普遍存在的战略竞争。作为回应，美国需要做在 COVID-19 之前就已经明确的事情：回到国际舞台上，开始为自己的治理和发展模式得分。遗憾的是，病毒本身的影响使这一点变得更加困难。

美国对北京当前行动的任何反击都不应阻止中美利用这场危机来扭转两国关系螺旋下降——这实际上也是当务之急。如果说病毒让中美改善关系变得更加困难，那么它也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让双方能够抛开分歧，认识到朝着共同目标努力可以带来短期和长期利益。

COVID-19 并没有改变美中战略关系的基本面。地缘政治、互不信任和系统性竞争一直在推动两国走向对抗和相互指责。此外，双方都在努力加强自己的地位，让对方为任何障碍负责。但这种趋势并非不可改变。北京和华盛顿仍然可以采取行动缓和紧张局势，并开辟一条通往和解与和平共处的道路。但这要求双方更准确地理解彼此的观点和抱负，认识到两国共享的全球利益，尤其是控制 COVID-19 方面的利益，并接受相互依存现实。

中美关系将不可避免地兼具竞争与合作。现在是时候扩大合

作渠道了，这有助于两国脱离疫情暴发前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

美国外交

新冠危机将改变美国国家安全优先事项排序

《政客》杂志网站近期载文称，若将美国外交政策建制派比作高中食堂，那么恐怖主义与核武器专家是最受欢迎的孩子，而全球健康专家只能躲在角落里，但新冠疫情正在颠覆这种局面。

一些人希望新冠危机能促使美国重新考虑外交政策的重点，将更多资金、研究以及政治行动投入到解决复杂的系统性问题（比如流行病），这能在几周内令世界发生改变。包括特朗普前高级顾问在内的一些人呼吁成立类似“9·11”委员会的机构，对新冠危机以及如何应对进行深入研究。

新美国安全中心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指出，这次疫情突显了一个事实，即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问题是紧密交织的。他说：“美国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只有在发生重大事件后，才会意识到自己一直在梦游，把注意力放在了错误的事情上，随后便想着抛弃过去所有的关注点，将注意力集中到另一件事上。但现实是，绝不仅仅只存在一个问题。”

在新冠疫情暴发前，美国外交政策圈就出现了一场声势越发浩大的运动，人们认为应从纠缠了二十年之久的与恐怖主义相关的“无止尽战争”中解脱出来了，此次疫情可能会加速这一进程。

疫情之下，“美国优先”政策将带来危险

《外交事务》期刊网站4月4日登载外交学会高级研究员菲

利普·戈登 (Philip H. Gordon) 的文章称，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将给美国带来危害，美国应继续提供对外援助、发挥全球领导力。

早在新冠危机之前，特朗普政府就一再提议大幅削减对外援助和全球卫生资金。虽然，特朗普并未完全忽视世界其他地区，自疫情暴发以来，美国政府已宣布额外提供 2.74 亿美元的国际援助，但相比全球疫情程度，这只是杯水车薪。此外，特朗普政府最近提出的削减外国援助计划可能将带来不良效应。

面对这场全球危机，特朗普可能会试图在美国周围筑起高墙，让其他国家自行解决问题。这种想法是危险的。对美国来说，更现实的选择是下定决心领导各国共同抗击疫情。然而，在当前的危机中，美国并未发挥这样的领导作用。

尽管美国已经错失了许多时间和机会，但政府和国会仍然可以采取行动。华盛顿应该重新考虑削减援助的计划，因为这将导致许多人失去生命，并给美国国内的应对政策带来不利影响。美国应同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独立渠道向那些经济脆弱、无力应对危机的国家提供财政援助。

此外，本次疫情还将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在制定进一步立法与补充资金政策时应当考虑到这一现实，为国际科学合作提供更多资源，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支持，为全球应对行动提供灵活的紧急资金。

从过往的流行性疾病经验中可以得出结论，人们有可能因此取得进步。但首先美国必须认识到，只有当世界其他地区也安全时，美国民众才会真正安全。唯有采取真正的全球应对措施，才能打败病毒。

美前官员：美国应引领各国协调应对疫情

美国《政客》杂志网站4月8日登载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美国副国防部长的米歇尔·弗卢努瓦（Michèle A. Flournoy）与国土安全和反恐顾问的丽莎·莫纳科（Lisa O. Monaco）的文章称，新冠肺炎是个公共卫生悲剧，如果美国应对不慎，它有可能转变为地缘政治悲剧，美国应加快领导各国协调应对。

美国对疫情的处理，将决定美国经济的长期弹性，以及美国在全球竞争、引领和保护美国自身的能力。如果美国继续推行孤立主义，更多国家会认为美国的实力有所下降，可能被中国填补领导层的空缺。如果美国想恢复领导地位，需要组织国际间的集体行动来抗击疫情。

历史上，美国在全球危机中表现出色——与盟友密切合作，利用国际联盟和组织协调行动，支持整个国际社会为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帮助，而非仅仅关注本国的情况。然而，这次对抗新冠病毒，特朗普政府在国际舞台上基本无所作为，将领导的角色让给了其他国家。美国在二十国集团中没有发挥作用来确保各国做出有效回应。是中国向意大利提供急需的医疗物资、为亚太地区提供医疗援助，进而巩固了中国政府的影响力和外交关系。

在国际上发挥领导作用，帮助弱势国家解决危机有助于保护美国自身卫生安全，也符合美国的经济和外交利益。特朗普政府应推动联合国机构和全球非政府组织为在病毒面前尤为脆弱的国家提供帮助，召集二十国集团成员国协调包括来自中国的国际援助。总统应要求国会批准额外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资金，并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应对病毒造成的经济破坏。

PIIE: 美国限制个人防护产品出口将危及自身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网站载文称,在应对 COVID-19 大流行所需的关键医疗设备严重短缺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采取的出口限制措施可能会将美国医护人员置于危险之中,原因很简单:美国的医疗设备及其零部件依赖进口。文章摘要如下:

根据特朗普援引《国防生产法案》(DPA)发布的总统备忘录以及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随后发布的规定,有五种个人防护装备(PPE)产品将受到出口限制:N-95 过滤面罩式呼吸器;其他过滤面罩式呼吸器;弹性材料、空气净化呼吸器和相关的微粒过滤器/滤芯;PPE 外科口罩;PPE 手套或外科手套。

特朗普政府的出口限制适用于 2019 年价值约达 11 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其中包括一次性呼吸器和外科口罩(5.11 亿美元)、空气净化呼吸器(4.15 亿美元)和医用手套(1.5 亿美元)。然而,美国进口的呼吸器、口罩和手套是出口的五倍多,美国人在 2019 年购买了大约 62 亿美元的个人防护装备。

对于美国的出口限制措施,美国的贸易伙伴们会采取报复吗?历史记录很难让人安心。目前白宫指导供应链工作的是纳瓦罗。两年前,在特朗普对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外国产钢铁、铝以及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前夕,纳瓦罗做出了“著名的”预测,“我不相信有哪个国家会报复”。事实证明,几乎每一个美国主要贸易伙伴都进行了报复。

如今,外国政府也可以切断美国人获得其他个人防护装备(如面罩、护目镜、医用防护服、呼吸机、导管、X 光设备或 CT 扫描仪)的进口途径。美国工厂生产医疗设备所需的外国原料也面临危机。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警告特朗普政府,其政策可能会招致报复。

除此之外，美国的出口限制也可能影响企业的投资选择，包括如何分配资源、提高 PPE 产量，满足大幅增长的全球需求。特朗普的政策降低了美国作为生产地的相对吸引力。一家公司可能会选择在一个既能服务当地民众又能向世界各地有需要的客户销售产品的市场扩大产能。在全球经济濒临崩溃、许多公司苦苦挣扎的情况下，推动它们把生产设施和工作机会从美国转移出去的政策对谁都没有好处。

最新数据显示，2020 年 1 月和 2 月，美国从中国以外进口的呼吸器、口罩和手套同比增加了 7%。在此期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这三种产品下降了 21%，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特朗普根据“301”条款征收关税的影响。

特朗普贸易战的一个重要后果是，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呼吸器、口罩和手套大幅减少。15%的关税在 2019 年 9 月生效后，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这类产品大幅减少，并持续到 2020 年 2 月。从中国的进口可能在 4 月份才会回升，因为直到 3 月 17 日，美国政府才取消了阻碍美国人获取医用口罩和一次性呼吸器的关税。

截至 2020 年 2 月，美国从世界其他地区进口的呼吸器、口罩和手套继续呈上升趋势。但如果出口限制遍及全球，这种趋势最终可能会逆转。

美国既是关键医疗设备的出口国，也是进口国，在这次疫情期间，这一事实应该被视为一种“恩赐”，而非“诅咒”。随着疫情席卷全球，市场相继关闭，拥有进口渠道意味着美国可以从中国等国家购买医疗设备，至少现在，中国能够维持其产量和出口。

美国政治/其他

美媒：有关社交距离的文化战已经打响

《大西洋月刊》杂志网站 3 月 30 日载文称，3 月早些时候，保持社交距离还未令政党出现两极分化，但这种共识并未持续很久。特朗普显然已经对隔离与封锁政策失去了耐心，他在 3 月下旬呼吁迅速恢复正常秩序。

专家一致认为，保持社交距离对遏制新冠病毒传播至关重要，将之政治化可能会产生危险的后果。当然，并非所有无视“保持社交距离”的人都在将这一问题政治化，许多人无法承担停止工作的代价。除了个人行为之外，对于如何在应对全球疫情的同时平衡经济需求，还需要进行一场合理的辩论。

尽管如此，围绕公共卫生的两极分化似乎在加剧。3 月，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的共和党籍州长拒绝了希望制定更强有力疫情应对政策的呼声。民调数据显示，与民主党人相比，美国各地的共和党人对疫情的担忧程度要低得多。根据《纽约时报》最近的一项调查，在减少个人旅行时间最少的 25 个州中，特朗普赢得了 23 个。部分原因可能是，迄今美国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沿海城市中心。同时，意识形态因素也在发挥作用。

有关新冠危机中美国金融稳定政策的三个问题

布鲁金斯学会网站 4 月 8 日载文表示，当前，有三个关于美国金融稳定政策的重要问题需要回答：金融稳定政策在总体政策应对措施中处于什么位置？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还需要采取哪些行动？

关于第一问，单靠金融稳定政策无法解决当前危机。金融稳定政策为重要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和为家庭和企业直接提供救济的财政政策提供支持，通过降低借贷成本、确保家庭和企业所需的信贷流动，来应对经济和金融方面的影响，帮助稳定局势。

关于第二问，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首先是货币政策。美联储两次降息，将利率维持在0%至0.25%区间。此外，在紧急流动资金供应方面，美联储迅速购买大量国债和其他联邦政府债券，随后开设了贷款工具，主要目标是为企业提供信贷。最引人注目的新宏观审慎政策是，鼓励银行动用自2008年金融危机结束以来积累的资本和流动性缓冲。联邦银行监管机构最近还向金融机构发布指导意见，允许受新冠病毒影响的借款人推迟还贷。

关于第三问，还需采取哪些措施？一个重要领域是为小企业提供更多的帮助。《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中的贷款项目可以提供贷款，帮助企业在收入立即减少与经济复苏之间架起桥梁。另一个需要关注的领域是，当家庭和企业推迟支付抵押贷款时可能产生的后果。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金融稳定能够令大银行拥有足够的资本来应对严重的长期衰退，还能确保当前的衰退不会向纵深发展。想要取得快速强劲的复苏，至关重要的一点是，金融机构的偿付能力不应受到质疑，并可以继续发挥中介机构的作用。

美智库：美国可分五阶段恢复正常生活

传统基金会网站载文称，该智库为应对疫情成立的“国家新冠病毒恢复委员会”于4月8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17位专家与会商讨了如何“拯救生命与生计”。会议结束时，委员会宣布了一项五阶段计划，涉及何时以及如何开始让美国民众的生活

“恢复正常”。

第一，根据科学数据，区域一级可恢复正常商业活动。在执行该措施前，应稳定卫生保健系统，加强检测、报告和接触者追踪，继续遵循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关于缓解措施的指导方针。

第二，在扩大检测、报告和接触者追踪的同时，降低新冠病毒的传播速度。在新增病例开始减少前，遵循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关于保持社交距离和其他缓解措施的指导。

第三，继续运用科学手段。增加新诊断测试的可用性和速度，同时支持加速并引进已证明有效的治疗方法和疫苗。

第四，确立美国在引领自由世界经济复苏方面的领导地位。在限制再次感染威胁的同时，采取风险通报措施恢复国际旅行。与主要战略盟友结成伙伴，增强自由市场的经济自由和伙伴关系。

第五，减少未来病毒大流行的风险。对国家与各州储备进行投资，改革供应链，调整产能以满足危机时的需求，开发抗病毒药物的供应，寻求研发新冠病毒疫苗，投资国际生物监控网络，通过协作发现并控制新的传染病。

特朗普政府可从以往的危机中汲取经验来应对疫情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登载美国前财政部长乔治·舒尔茨（George P. Shultz）等前官员的文章称，为应对 COVID-19 大流行，政策制定者应尽可能保持市场正常运转，并为私营部门提供强有力的激励。在这方面，历史可以提供有益的借鉴：

首先，政府应该对企业和雇员施加最小限度的限制，以便利私营部门进行临时应急。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减少监管是经济繁荣的良方。让个体承担责任也至关重要。在肯尼迪以及

约翰逊总统执政期间，政府频繁干预重大劳资纠纷，此类纠纷最终总会在白宫得到解决，但破坏了私人谈判体系。1969年，面临码头工人罢工的尼克松总统让各方知道，他们必须自己承担责任，解决问题。各方的确自己解决了问题。

其次，政策制定者不应干预价格。在接手通胀压力巨大的经济后，尼克松政府最终在1971年引入了强制性的工资和价格控制措施，并得到了两党的广泛支持。尽管这些措施起初似乎奏效，但最终却损害了经济。相比之下，里根总统采取了久经考验的宏观经济政策，减轻了监管负担，并迅速降低了税率，所有这些措施都起到了早先政府干预措施没有起到的作用。

另一个指导原则是让市场自行调整。1971年夏季，美国的赤字支出和国内通胀导致美元被高估，欧洲国家开始以固定汇率兑换黄金，诺克斯堡出现挤兑。尼克松随后关闭了黄金兑换窗口，开始向采用灵活汇率的全球体系迈进。在经历了最初的一场保卫战之后，新体系最终运转良好。

更多的政府需要认识到，开放的市场能够改善经济。如今的市场干预措施需要减少。但有时，政府必须采取行动，防止原本适当的政策被滥用，威胁重要市场的运作。政府必须谨慎适当地进行干预。“9·11”恐怖袭击之后，小布什政府努力保持市场开放。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是切断“基地”组织的资金来源，同时不影响经济增长所需的全球资金流动。这一战略被证明是成功的：经济并没有崩溃，“9·11”委员会后来给政府的经济政策回应打了“A”级（也是唯一一个“A”）。

最后，政策制定者必须关注经济影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以退税为核心的短期经济刺激计划，而这种纾困心态在当年早些时候就体现在了对贝尔斯登公司的纾困行动中。最终，人们把大部分退款存了起来，经济继续下

滑。因此，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政府必须鼓励美国纳税人把来自联邦政府的临时补贴花掉，包括花在仍在运转、未来可能增长的经济领域，如在线销售和远程工作。

除了当前的公共卫生要务，美国还必须制定一项不凌驾于市场之上的经济战略。有效执行这些政策要求政府和私营部门行动者之间持续交流，以免官僚主义惰性和不必要的繁文缛节拖慢行动。以往危机的主要教训一直是：保持市场开放，并为私营部门提供强有力的激励。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